

黃寬留英期間所受之教育

張 娟*



黃寬是第一位留學歐洲並獲得西醫資格的中國人，但由於他行事低調，著述不多，後人對其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期間的狀況一直不甚瞭解。本文試圖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¹⁾的基礎上，利用愛丁堡大學有關黃寬的學籍檔案等資料⁽²⁾，並結合19世紀英國醫學教育制度，勾勒及分析黃寬留英期間所受之教育情況，以期盡量還原這位中國西醫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之先驅的早年求學生涯。

關於黃寬留英始末的多種解說

黃寬(1829-1878)，字綽卿，廣東香山縣東岸村（今珠海市唐家灣鎮東岸村）人，1840年3月13日⁽³⁾進入澳門的馬禮遜學校（Morrison School）讀書，1847年隨布朗牧師（Samuel Robbins Brown）赴美，1850年轉赴蘇格蘭愛丁堡大學學習，1857年回國後致力於西醫診療及教育事業，被譽為西醫在中國“傳播與發展的開山祖與奠基人”⁽⁴⁾，同時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由筆者目前所見之資料來看，最早系統敘述黃寬生平的可能是他的外甥女余學玲於1908年11月5日發表在廣州《醫學衛生報》上的〈中國人始留學歐洲習醫術者黃公綽卿行述〉一文，該文對於黃寬留學期間的狀況有如下描述：

美商人某君經商於十三行，因獲鉅資。布朗君諷以勿忘所自，宜出資助中土人遊學，庶有以報此邦人仕。於是某君出資助公學。遂隨布朗君至美，時為道光二十年(1840)，公年方十有八也。留美國者凡四年，卒業於文科大學，而公更有志於醫，知交亦多勸更就醫學。其時英國蘇格蘭之壹丁不爾厄(Edinburgh)醫科大學，聲稱冠歐美，公謀就彼求學。然商人某君已前卒，無復有供學費者。後得倫敦公會資助之，乃獲遂其志，益復苦學。年二十有六，遂成學，考列名次第五，授醫科大學博士頭銜。復留英國益精閱歷者二年，乃歸國，時為咸豐六年(1856)，年方二十有八也。⁽⁵⁾

*張娟，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文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該報同時在當期扉頁刊登了由余學玲提供的黃寬肖像一幅，註明為“中國人始留學歐洲習醫術者黃綽卿先生肖像(WONG CHUEK HING, M. D. ‘The first Chinese who studied foreign medicine in England’)”，像下附有黃寬生平英文簡介一篇，相信也是出自余學玲的介紹。按此英文簡介的說明，黃寬“1840至1854年間，先在美國由文學專業畢業，而後立即轉入愛丁堡學習西醫，1856年通過醫學課程的學習後回到廣州成為中華帝國海軍的一名外科醫生”⁽⁶⁾。由余學玲稱黃寬獲“醫科大學博士頭銜”可知，此處之“M.D.”一詞應是“Medicine Doctor”的縮寫。

根據余學玲的回憶，黃寬1840年赴美，四年後赴愛丁堡，1854年於醫學院畢業，之後在當地實習兩年，1856年回國。余學玲雖然為黃寬外甥，但可能由於非同齡人的關係，她的回憶有明顯的錯誤之處，其源頭就在於將黃寬赴美的時間記為1840年，而這其實是黃寬進入馬禮遜學校的時間。余學玲自己也在此文中聲稱黃寬生於“道光己丑(1829)”，“年十二至澳門”，則應為1840年(道光二十年)。由於這一疏忽，導致余學玲此後對於時間的一系列推理都值得商榷。此外，眾所周知，容閔、黃寬、黃勝三人在美國期間就讀的是大學預科課程，並未曾進入大學學習，更未曾獲得學位，所以余學玲關於黃寬在美獲得文學學位的說法也是有誤的。

國人瞭解黃寬生平的另一信息源頭是他的同學——容閔的回憶。1909年，容閔的回憶錄 *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 在美國出版，並由徐鳳石、譚鐵樵譯為《西學東漸記》後於1915年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由於容閔的關係，此書流傳頗廣，而其中關於黃寬留學英國的描述也成為後來史學界推測這段歷史的主要依據之一：

翌年(1850)之夏，二人同時畢業。黃寬旋即妥備行裝，徑赴蘇格蘭入愛丁堡大學。(……)黃寬後在愛丁堡大學學習醫，歷七年之苦學，卒以第三人畢業，為中國學生界增一榮譽。於一八五七年歸國懸壺，營業頗發達。⁽⁷⁾

根據容閔的回憶，黃寬於1850年夏天由美國啟程赴愛丁堡，經過七年的學習，以第三名成績畢業後回國。

1932年，由王吉民(K. Chimin Wong)、伍連德(Wu Lien-Teh)用英文撰寫的《中國醫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在天津出版，其中對於黃寬的留學生涯有了另一個版本的描述：

和另外兩位學生一起(容閔與黃勝)，他跟隨他的老師去了美國並獲得了一個文學學位。此後，在香港的幾位善心商人的資助下，他於1848至1853年繼續在愛丁堡大學學習醫學。他獲得了一些獎勵，以班級第五名的成績光榮畢業後，繼續進行病理學和解剖學的再學習(post-graduate work)，並獲得了M.D.學位。在校期間，他已經接受了愛丁堡醫藥傳教會(Edinburgh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的影響。畢業後，他為倫敦傳教會(London Mission)服務並被派回到中國。1857年回國後，黃寬醫生先在香港開設了一家診所，而後於第二年搬至廣州接續倫敦傳教會的工作。⁽⁸⁾

書中雖然收錄了余學玲提供給《醫學衛生報》的黃寬肖像，並表述了一些與余學玲相同的觀點(例如認為黃寬在美國獲得文學學位、以第五名的成績從愛丁堡畢業)，但從其註釋中可知，王吉民與伍連德撰寫這段黃寬傳記時似乎並未參考余學玲和容閔的回憶，而是主要根據維魏林⁽⁹⁾(Dr. William Lockhart)的《在華行醫二十年》(*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以及《教務雜誌》(*Chinese Recorder*)中的資料，並進行了一些採訪——主要以 Dr. C. S. Lin⁽¹⁰⁾ 為對象。王、伍二人認為黃寬在美國期間就已經獲得了文學學位，1848至1853年間於愛丁堡習醫，以第五名成績畢業，並繼續學習病理學和解剖學課程，獲得 M.D. (Medicine Doctor)學位，然後於1857年回國。

至1954年，王吉民又在《中華醫史雜誌》第二號發表〈我國早期留學西洋習醫者黃寬傳略〉一文，並在文後附有“黃寬年譜簡表”。相比於

之前的《中國醫史》，王吉民此次註明參考了余學玲的文章，對黃寬留學生涯的敘述也有所修正。按照此文的觀點，黃寬1850年在美國期間就獲得文學士學位，1855年又在愛丁堡獲得醫學學士學位，以第五名成績畢業後於1856、1857年在醫院實習，1857年回到香港。但是對黃寬實習後所獲之學位，卻沒有再提及。⁽¹¹⁾

1908年余學玲發表黃寬傳記時，時任《醫學衛生報》主筆之一的陳垣先生曾為黃寬的肖像題寫過一篇短文，敘述刊登此像及余學玲之文的緣由：

先生生平具見余女士所為先生行述。計先生留學西洋習醫術，尚在慈溪舒氏⁽¹²⁾之前。舒氏於同治初習醫術於米洲，歸國後曾為上海製造局譯《內科理法》、《臨陣傷科捷要》等書，知者猶眾。先生歸粵，雖嘗為博濟醫學教授，而歷年不久，早卒，無著述，知者極少。吾之識先生名，僅在《西藥略釋》莆田林氏序⁽¹³⁾中，不以為意也。聞禰翹雲、梁慎餘⁽¹⁴⁾二君言，始知先生為我國洋醫前輩。五十年前，凡歐米之人居留廣州者，有疾無不歸先生治療。所有兵艦，亦概以先生為醫官。先生在，雖有歐米醫，莫之任也。以故聲名藉甚，起家至鉅富，是宜有傳。奈何卒後才三十歲，僅得留姓氏於藥物學書之首，亦吾人薄於歷史觀念之過也。余女士為先生之甥，知先生家世甚悉，乃求先生遺像及其言行於女士家。女士能文章，有所言，可以備他日史家之採矣。抑吾聞之，先生之留學歐洲，不獨為我邦醫人之始，並且先於日本。日本文久二年乃有伊東玄伯、林研海等赴和蘭習醫術，當我同治元年也。而先生已於咸豐六年卒業歸國矣。吾國革新事業類多先於人，而進步則不免在人後，皆後起者之無以繼先民哉！戊申十月陳援庵。⁽¹⁵⁾

正如陳垣先生所言，黃寬一生為西醫診療及教育事業而勞碌，無專著行世，加之他為人低調，壯年早逝，所以後人對其知之甚少，猜測頗多。在他去世後僅三十年，余學玲和容閔這兩位他生前的親人與友人就已經對其留學英國一事頗多誤記、說法不一，更況後人乎？此後的醫學界

與史學界瞭解黃寬留學事蹟的主要渠道，即基本上依據前述的這幾處各不相同的考證和回憶⁽¹⁶⁾，或採信其一，或兼採各家，或據其推理，以致眾說紛紜：關於黃寬最終所獲之學位，有博士⁽¹⁷⁾、碩士⁽¹⁸⁾、學士⁽¹⁹⁾三種說法；關於黃寬就讀的專業，則有先文學後醫學⁽²⁰⁾，以及專修醫科兩種說法；關於黃寬本科畢業後的去向，則基本都認為是留駐當地醫院繼續研習病理學和解剖學課程兩年，而後歸國行醫。

直至2007年3月，愛丁堡大學在北京為中國留學生舉行畢業典禮，其間向黃寬故鄉珠海市贈送了黃寬的考試成績單、選課記錄、畢業論文等一批珍貴檔案，才使我們今天能够在借鑒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利用這些第一手資料窺見黃寬早年的留英生涯，初步揭示這一歷史謎團。

黃寬留英期間的學制與學位

根據容閔的回憶，黃寬於1850年夏由孟松中學畢業後啟程赴愛丁堡。而當時從孟松學校所在的美國東海岸馬薩諸塞州，穿越大西洋到達蘇格蘭的愛丁堡大學，也並不是一件需要耗費太久時間的事情，因而在愛丁堡大學1850年的新生入學註冊記錄中⁽²¹⁾，第113位——來自“China”的“Wong Afun”（黃寬）赫然在列，時間大約是在11月初，可見容閔此處的回憶當屬事實。另據倫敦傳教會的檔案顯示，黃寬早在1856年8月就已接受該會的派遣啟程回國，到達中國的第一站——香港，是在1857年的1月22日，並非余學玲和陳垣所言的咸豐六年（1856）。所以，黃寬在愛丁堡大學的時間前後不到六年，即從1850年11月至1856年8月，而非容閔所說的“歷七年之苦學”。

1850年11月黃寬入學登記時，入讀院系（Faculty）為“Lit”（Literature）。而在1851年的新生入學註冊記錄中，卻再一次出現了黃寬的名字，所不同的是這次他被寫作“Wong Fún”，位列第23位，而入讀院系變成了“Md”（Medicine），註冊日期是1851年10月30日。這說明黃寬的確曾經學習文學，不過並非如余學玲、王吉民所言是在美國期間，而是在進入愛丁堡大學的第一年學習文學，然後於第二年轉入醫學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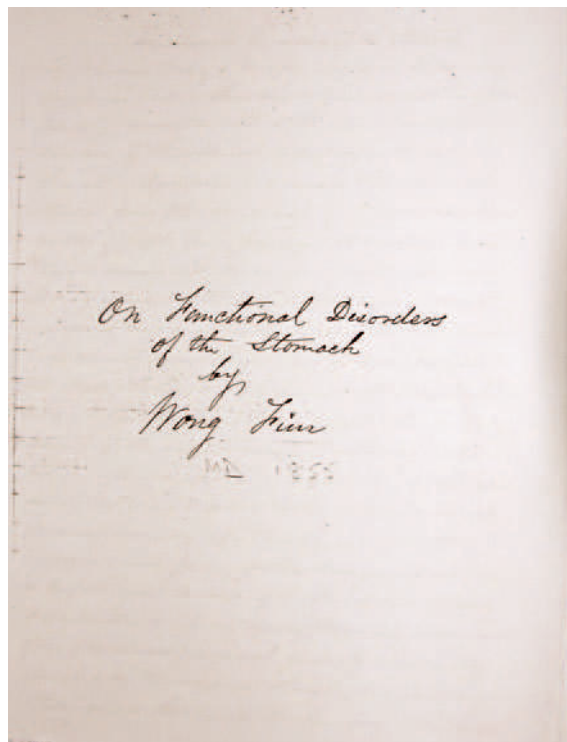
但筆者認為，黃寬首年入讀文學院的原因並不是要攻讀文學學位，而主要是為了補習拉丁語。根據容閎的回憶，黃寬是接受了香港資助人的建議，“至英國蘇格蘭省愛丁堡大學學習專門科”⁽²³⁾。容閎雖然沒有言明這個“專門科”究竟是甚麼，但從黃寬日後的經歷來看，這個“專門科”無疑就是西醫學，況且資助黃寬去愛丁堡學習的正是香港的醫藥傳教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²⁴⁾黃寬既然對這個安排欣然接受，啓程赴學，應當不會又如此之快地改變主意。而他之所以在入學後的第一年修讀文學，是由於在19世紀的英國醫學教育中，藥物學等諸多課程都是以拉丁文為基礎（例如在英國1815年7月31日頒佈的藥劑師考試規定中，就明確要求應試者具有相當的拉丁語水平，考試科目中還包括拉丁文處方和藥典選段的翻譯⁽²⁵⁾），而黃寬雖然在孟松學校時曾與容閎一道“治拉丁文十五月”⁽²⁶⁾，但這種水平連應付大學入學考試都“實為未足”⁽²⁷⁾，又怎能適應西醫學這一“專門科”學習之需要？所以，進入文學院補習拉丁文，想必是從黃寬自身的情況及教學的需要出發而做的靈活調整。經過一年的拉丁文學習，黃寬在1851年10月30日轉入醫學院，並於11月3日參加了醫學院的拉丁文入學考試，成績尚算優良，寫作練習（Written Exercise）和口語（Oral）均得“AB”。⁽²⁸⁾

經過在醫學院四年的學習，黃寬順利畢業。愛丁堡當地報紙 *Witness* 在1855年8月4日的報導中宣稱：“星期三（1855年8月1日）是愛丁堡大學舉行畢業典禮的日子，（……）五十四位紳士被授予醫學博士（Medicine Doctor）學位，他們來自世界上的每個角落，其中四位來自埃及，一位來自中國”，報導中還提到了這位中國人的名字——黃寬，以及他所撰寫的畢業論文——《關於胃功能紊亂的研究》（*On Functional Disorders of the Stomach*）。⁽²⁹⁾而在黃寬手書的這篇畢業論文封面上，也確實落有1855年的日期。⁽³⁰⁾

問題就在於黃寬1855年本科畢業後至歸國前，是否通過在醫院的實習與課程的進修而獲得更高的學位。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首先要從瞭解英國醫學學位授予制度的變遷入手。英國的醫學學位授予始於14世紀的牛津大學，學生經過四至八年的學習即可獲得學士學位。⁽³¹⁾為加強學生的實

踐能力，臨床學科的本科畢業生“仍須在指定醫院作住院醫生，服務十二個月”⁽³²⁾，經原校考核，發給‘實習證書’（Certificate of Experience）。再經過注冊資格考試合格，方可取得執照行醫”⁽³³⁾。而“醫學博士（M.D.）之授予係根據研究工作與論文水平”⁽³⁴⁾確定。但早期英國大學中的碩士和博士學位祇是表示獲得者具有在大學內擔任教師的資格，並非是比學士更高級別的正式學位。⁽³⁵⁾直到“1858年，英國成立了醫學總會，（……）才開始現代醫學教育，並開始培養全科醫師”⁽³⁶⁾。英國真正的現代高等教育博士學位體系的建立，是19世紀中葉產業革命興起後的結果，直到1917年，牛津大學才率先設立了博士學位（Doctor of Philosophy）體系。⁽³⁷⁾所以，1856年離開愛丁堡的黃寬所獲得的“M.D.”祇是一種資格證明，而並非現代意義上的博士學位。

試想，黃寬在愛丁堡大學留學前後不足六年，又怎能够如此之快地完成從學士直到博士階段的學習？後人可能也有這樣的懷疑，所以才將黃寬畢業後的進修與博士學位的獲得聯繫起來。



黃寬畢業論文封面

其實，從王吉民和伍連德的撰述中，我們就應該已經發現黃寬畢業後並未攻讀更高學位的蛛絲馬跡：《中國醫史》在形容黃寬畢業後的進修時使用的是“post-graduate work”而非“postgraduate work”，後者專指研究生學習，而前者則僅是指畢業後的繼續學習。此外，余學玲的論述中明確提到黃寬獲“醫科大學博士頭銜”在前，而後“復留英國益精閱歷者二年”；按照上引*Witness*的報道，黃寬獲得“Medicine Doctor”的時間也是在畢業當年(1855)，而非《中國醫史》等所稱的進修兩年之後。如果是這樣，則說明黃寬畢業後的學習與“Medicine Doctor”的獲得並無關係。由於後人對“Medicine Doctor”的理解有誤，誤以為黃寬畢業後的學習與此有關，從而將其獲此稱謂的時間推後。“Medicine Doctor”按字面意思似乎應該翻譯為“醫學博士”，但究其歷史之涵義却並非如此。也許正因為這樣，王吉民在1954年的中文版黃寬傳略中為避免歧義而回避了這一細節，這或許正是陳寅恪先生曾說的“瞭解之同情”吧。

由上可知，黃寬在愛丁堡大學就讀的實際上是一個“1+4+1”的學制：1850年11月入讀文學系，次年10月轉入醫學院，並於四年後(1855年8月)畢業獲醫學學士學位，在其後的一年中以住院醫生的身份在當地醫院服務，並繼續相關學習，1856年夏接受倫敦傳教會的派遣啓程回國。可能由於黃寬的成績較為優秀，他在畢業時被授予了“Medicine Doctor”稱號，這雖然並不是現在所理解的博士學位，祇是他可以在大學從事醫學教育的資格證明，但這也為黃寬日後在博濟醫院開展西醫教學工作奠定了條件。

黃寬留英期間的課程與成績

對於黃寬留學愛丁堡期間所學之課程，以往的論述通常祇說其在醫院實習期間繼續學習病理學和解剖學，對其大學五年內具體所學之課程並無詳述。筆者根據愛丁堡大學保存的黃寬選課記錄及考試成績檔案⁽³⁸⁾，將其在醫學院所學之課程情況整理如下表：

課程名稱	成績	學習時間
解剖學(Anatomy)	B	1851-1853
化學(Chemistry)	AB.r.B	1851-1852
植物學(Botany)	AB+	1851-1852
醫用解剖學(Practical Anatomy)	AB	1851-1854
醫學理論(Theory of Medicine)		1852-1853
博物學(Natural History)	AB+	1852-1853
內科實踐(Practice of Medicine)	AB	1852-1853
外科手術(Surgery)	B	1852-1853
醫用化學(Practical Chemistry)		1852-1853
醫院臨床實習(Clinical Medicine, with Hospital attendance)		1852-1854
藥理學(Materia Medica)	AB.r.B	1853-1854
醫術實踐(Practice of Physic)	AB	1853-1854
實用藥劑學(Practical Pharmacy)		1853-1854
臨床外科學(Clinical Surgery)		1853-1854
法醫學(Medical Jurisprudence)	AB	1854
藥房管理(Dispensary)		1854
助產術(Midwifery)	AB	1854-1855
病理學(Pathology)	AB	1854-1856

黃寬所學之課程可以大致分為三類：一類是與醫學有關的基礎科學課程，包括化學、植物學、解剖學和博物學；第二類是基礎醫學類課程，包括醫學理論、藥理學、實用藥劑學、醫用解剖學、醫用化學等；另一類則是應用性較強的臨床醫學類課程，包括內科實踐、外科手術、醫院臨床實習、醫術實踐、臨床外科學、法醫學、藥房管理、助產術等。前兩年以基礎科學和基礎醫學為主，從第二年開始逐漸加大臨床醫學的教學比重，在整個本科階段的學習中，臨床醫學部分無疑佔了較大的份量，而這也符合愛丁堡大學醫學院的一貫風格——它是一所以臨床講座為主要教學手段的醫學院。⁽³⁹⁾

在目前所見之黃寬所學課程中，祇有病理學課程的學習延遲至1856年，而其餘課程均已在1855年或之前結業，解剖學及實用解剖學課程也已經分別於1853年和1854年修完。至少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黃寬在本科畢業後並沒有繼續學習解剖學的課程。筆者認為，由於病理學以病人或病人的組織、器官、體液等為研究對象，因而屍體解剖是病理學研究常用的手段之一⁽⁴⁰⁾，所以黃寬很可能在研究病理學期間要不可避免地經常進行解剖工作，從而造成了他在醫院實習期間繼續學習病理學和解剖學課程的誤解。同時，由於病理學既是一門基礎醫學學科，又是“學習臨床醫學的必要基礎”，是“溝通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的橋樑學科”⁽⁴¹⁾，所以這也再一次證明，黃寬本科畢業後在醫院所進行的學習，是為進入臨床行醫階段所做的準備，而非為攻讀更高級別的學位。

在黃寬的課程表中，解剖、手術等外科所需之學問佔據了較大的比重，而不見流行病學、呼吸病學等內科學所學之理論課程。可以認為黃寬在愛丁堡大學攻讀的是一個偏重於外科的臨床醫學課程體系，這可能也是黃寬日後行醫生涯中以外科見長、被譽為“好望角以東最負盛名之良外科”⁽⁴²⁾的根源所在。而他所學的“助產術”課程，可能也是使其成功施行中國第一例胚胎截開術的必要基礎。

從目前掌握的資料來看，黃寬在參加的全部科目考試中均得到了良好(B)以上的成績。時任愛丁堡大學教授的辛普森(Dr. Simpson)也在1855年的畢業生典禮上說道：

在你們中間，黃寬是一個最值得稱贊的謙虛好學的學生。在學業競爭中他所獲得的眾多獎勵與榮譽，讓我們可以懷有這樣的期許，這位中國留學歐洲第一人，一定會成為他的同胞中西方醫學的最好代表。我堅信，在座的各位，包括教授和畢業生，對他今後的事業與幸福懷着格外的興趣……⁽⁴³⁾

根據比黃寬低四屆並曾經同校一年的倫敦傳教會醫生傳教士韓雅各(James Henderson)的記載，黃寬曾在數百名同學參與的競賽中獨得三項桂冠中的兩項⁽⁴⁴⁾，這也許正是辛普森教授所言的“眾多獎勵與榮譽”中的一個案例。因而我們有理由相信，容閱筆下的黃寬以第三名畢業、或余學玲所言以第五名畢業的觀點，都是具有相當可信度的，祇是需要史料的進一步詳細證實。

餘 論

在愛丁堡的近六年時光，正值黃寬的青年時期，是他的醫術、眼界、學識以及人生觀、價值觀成型的重要時期，對於研究這位西學東漸的先驅具有重要價值。由於資料的缺乏，我們目前還無法對黃寬在愛丁堡期間的某些情況有確切的瞭解，例如他的交際圈、他首年學習文學的情況、他在醫院實習期間的具體工作、他參加醫生資格考試的情況等。但根據現有的材料，我們已經可以大致勾勒出黃寬在愛丁堡期間學習的經過：

1850年11月初入學，就讀於文學系，補修拉丁文課程。1851年10月31日轉入醫學院，攻讀以外科為主的臨床醫學課程。1855年8月以優異成績畢業，獲醫學學士學位，並被授予“Medicine Doctor”資格。之後進入當地醫院擔任住院醫生，並繼續研習病理學課程。1856年夏取得行醫執照，同年8月接受倫敦傳教會派遣啟程回國，1857年1月到達香港。在英國留學前後共計約六年。

雖然黃寬並未獲得現代意義上的博士學位(Ph.D.)，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在中國醫學史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黃寬的傑出醫術與醫德，使他“稱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的一個象

徵，也是中、英人民之間友誼的典範”⁽⁴⁵⁾，他已不需要任何的學位來為自己正名。

【本文承蒙臺灣清華大學蘇精教授、廣州中山大學吳義雄教授指正，特此鳴謝！】

【註】

- (1) 關於黃寬的研究，可參見蘇精：〈黃寬與黃勝：容閣的兩名同學〉，臺北《傳記文學》第45卷第2期，頁71-75；蘇精：〈黃寬與倫敦傳教會〉，氏著：《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年版，頁187-201。
- (2) 包括黃寬在愛丁堡的入學註冊記錄、選課記錄、考試試卷及畢業論文，2007年由愛丁堡大學張凌博士收集，後由愛丁堡大學將複印件贈送珠海市，現藏珠海市博物館。
- (3) 關於黃寬之籍貫與入讀馬禮遜學校的時間，見於馬禮遜教育協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第五屆年會報告，載《中華叢報》(The Chinese Repository)第十三卷，頁621；另可參見李志剛：《容閣與近代中國》，（臺北）正中書局1981年版，頁47。報告中稱黃寬的住址為“Tungngon”，一般認為這是粵語“東岸”的音譯。此外，東岸村黃氏族譜道光年間“卿”字輩下有載：“公諱寬，字□□，汝祥公之子”，疑為黃寬，參見譚如彤輝編輯：《黃如在堂族譜》卷三，民國九年(1920)秋月刊行，現藏珠海市檔案館。
- (4) 孫石月、樊華：〈我國第一位留學歐美的西醫大夫——黃寬〉，《山西教育學院學報》2009年9月第3卷第3期，頁18。
- (5) 余學玲：〈中國人始留學歐洲習醫術者黃公綽卿行述〉，廣州《醫學衛生報》第5期，1908年11月5日，頁29-30。
- (6) 譯自廣州《醫學衛生報》第5期，1908年11月5日，扉頁。
- (7) 容閣著，俾鐵樵、徐鳳石譯：《西學東漸記》，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頁22。
- (8) 譯自王吉民(K. Chimin Wong)、伍連德(Wu Lien-Teh)：《中國醫史》(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上海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年版，頁371-372。
- (9) 1811-1896，英國倫敦會醫生傳教士。1838年來華，1863年返回英國。
- (10) Dr. C. S. Lin 為何人尚待考。
- (11) 王吉民：〈我國早期留學西洋習醫者黃寬傳略〉，《中華醫史雜誌》1954年第2號，頁98-99。
- (12) 舒高第(1844-1919)，字德卿，1859年赴美學習醫學，1867年畢業後繼續修讀神學，1873年回國，曾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任職三十四年。
- (13) 《西藥略釋》由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口述、林湘東筆譯，光緒元年(1875)刊行，其序言中提到此書由“黃綽卿先生迭次校勘”。
- (14) 梁慎餘(1875-1947)，原名緘，又名培基，字慎餘，1879年畢業於博濟醫院南華醫學堂，與繭繭雲、陳垣同為光華醫社發起人，並創辦《醫學衛生報》。
- (15) 陳垣：〈黃綽卿像題詞〉，廣州《醫學衛生報》1908年11月5日第5期，後收入《陳垣早年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版，頁203-204。
- (16) 另有蘇精先生曾根據倫敦傳教會檔案揭示黃寬歸國時間，石寬女士利用愛丁堡大學1850、1851年入學註冊記錄揭示黃寬入校時間及就讀之專業。俱見下文。
- (17) 可參見王遠明主編：《風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譜》，廣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頁238-239；梁碧瑩：〈簡論黃寬、黃勝對西學的傳播〉，《廣東社會科學》1997年第4期，頁92-97。
- (18) 可參見容閣著，石寬譯註：《容閣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百家出版社2003年版，頁37，附註四；艾華：〈近代中國第一位西醫碩士黃寬〉，《廣州研究》1987年第9期，頁68。
- (19) 可參見蘇精：〈黃寬與黃勝：容閣的兩名同學〉，臺北《傳記文學》第45卷第2期，頁71-75。蘇精先生認為黃寬大學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後又獲取醫生資格。
- (20) 可參見珠海市唐家灣鎮人民政府、珠海市地方志辦公室合編：《唐家灣鎮志》，嶺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版，頁315。
- (21) 現藏愛丁堡大學圖書館。參見石寬：〈黃寬小傳〉，珠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珠海文史》第15輯，2005年12月版，頁171-174。
- (22) 蘇精：〈黃寬與倫敦傳教會〉，氏著：《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年版，頁193-194。
- (23) 容閣著，俾鐵樵、徐鳳石譯：《西學東漸記》，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頁21。
- (24) 蘇精：〈黃寬與黃勝：容閣的兩名同學〉，臺北《傳記文學》第45卷第2期，頁71-75。
- (25) Gilbert & Rivington, A Statement by the Society of Apothecaries on the Subject of their Administration of the Apothecaries' Act, Society of Apothecaries, London, 1844, p. 10.
- (26) (27) 容閣著，俾鐵樵、徐鳳石譯：《西學東漸記》，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頁25。
- (28) 珠海市博物館藏黃寬拉丁語考試(Latin Examination)成績檔案，資03183號。
- (29) 王近夏：〈醫療事業先驅黃寬留學時若干鮮為人知的細節〉，2007年3月19日《珠海特區報》，第1版。
- (30) 珠海市博物館藏黃寬畢業論文複印件，資03184號。
- (31) Vern L. Bullough, "Medicine Study at Mediaeval Oxford", Speculum, Vol. 36, No. 4, (Oct, 1961), pp. 605-606.
- (32) 這也剛好與黃寬1855年8月畢業、1856年8月啟程回國的時間相吻合。
- (33) (34) 金鋒：〈醫學學位的比較研究〉，《醫學教育》1986年第12期，頁10。
- (35) (37) 黃靜：〈中英研究生教育初析——兼論我國研究生教育的改革〉，《學位與研究生教育》1995年第3期，頁68-72。
- (36) John Allis 報告，楊建中譯：〈英國醫學教育的回顧〉，《國外醫學情報》第1卷第20期，1980年10月15日，頁365-366。
- (38) 現藏珠海市博物館，資03182、03183號。
- (39) 朱潮主編：《中外醫學教育史》，上海醫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頁326。
- (40) (41) 黃啟福：《病理學》，科學出版社2004年版，頁2。
- (42) 容閣著，俾鐵樵、徐鳳石譯：《西學東漸記》，珠海出版社2006年版，頁22。
- (43) 轉引自王近夏：〈醫療事業先驅黃寬留學時若干鮮為人知的細節〉，2007年3月19日《珠海特區報》，第1版。
- (44) 參見蘇精：〈黃寬與倫敦傳教會〉，氏著：《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年版，頁188。
- (45) 嘉約翰語，轉引自劉聖宜：〈容閣及其師友對中國近代化事業的貢獻〉，吳文萊主編：《容閣與中國近代化》，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頁353。